

生由香港返國報到，以住「中央黨部」為榮，我們倒屢歡迎。在當時本黨改造開始，積極準備反攻復國的氣氛中，住處雖狹，而心境甚寬。李之衍兄本已是一能言健談之士，加上天文地理無所不懂，民財建交樣樣皆精的袁晴公，我如參加了一個「個別教授」的補習班，兩師一徒，早、午、晚三市我都得接受他們兩位「教育」。

廿三年海外工作的經過，有苦惱，亦有快樂，先從人談起。

記得我在「海外工作十七年」一文中介紹，我在僑務委員會追隨過那幾位委員長的個性，我說：

「鄭彥葵先生像一位前線指揮官，陳清文先生像一位大家庭的家長，周書楷先生像一位名教授，高信先生像一位羣衆運動的領袖。」

我真衷心感激這幾位先生的愛護，我隨便各舉一二事，以表達我對他們的敬佩。

我追隨鄭彥葵先生最久，當我在僑務委員會擔任他的主任秘書的時候，有人曾問我是不是廣東順德人？（鄭先生是順德人）我說不是；他又問我是不是中山大學畢業？我說不是；他再問我是不是法國留學生？我又說不是。我這幾個「不是」，是可以打破別人對鄭先生用人態度的誤會了。

鄭委員長拍案叫絕

我於民國四十年奉派赴泰督導黨務，當時出差旅費每天美金三元，另全期工作費美金二百餘元。我出差回來，工作費還剩了美金一百二十元

，便附同支出憑證繳回第三組。側聞鄭先生曾為此「拍案叫絕」，我因非耳聞目擊，不敢引以自慰。不過，到了四十二年，我奉調僑務委員會第一處處長的時候，我曾叩詢鄭先生將我調職的理由，因為自思一個人的進退必須守份守度，為什麼會由第三組調到僑委會，亦得問明白，弄清楚。鄭先生當時回答我說：

「僑委會第一處最近要承辦一樁赴美特別移民的專案，二萬多人移民，問題繁雜，我要找一個操守好的人來負責。你到泰國回來繳回本組一百二十元美金，我覺得你可以擔負這工作。」

於是乎，我戴着這頂「高帽子」暈陶陶地來一次「黨員從政」去了。赴美特別移民專案辦妥結束，風平浪靜，沒有發生任何問題，也算不辱鄭先生的使命。

陳清老一進入僑務委員會大門而直至現在，都是以廣東話稱我為「閩佬」。粵語「閩佬」有幾種意義，一為指慷慨，一為指「富相」，一為指工作粗枝大葉。陳清老見我「面團團」，稱我為「閩佬」，大約是指第二種意義。民國四十八年，我奉中央派赴越南工作（那時，我任僑委會參事）。有一天，我在「中國之友社」（現人事行政局辦公大樓）咖啡間碰到陳清老，他劈頭就問：「閩佬，老鄭（指鄭彥葵先生）派你到越南，每月磅多少水？（粵語磅多少水是指給多少錢）」。我說：「每月美金兩百塊」。陳清老瞪大了眼睛，拍拍我的肩頭說：「兩百塊在那邊要討飯，我僑委會每月加你美金五十塊！」我說：「報告委員長，我不能伸手討錢呀！」陳先生說：

「傻佬，我下條子呀！」

陳清老一生就是一個「爽」字、形相「爽」、談吐「爽」、做事「爽」！

陳清老去，周書楷先生來，我從越南回國第一次參加業務會報之後，周先生認為我擔任參事太閒，要我擔任處長，我在他的辦公室當面報告他，我什麼都不如原處長，什麼，什麼不適應擔任處長，他當時沒有再進一步催迫。稍後，鄭彥葵先生找我回到第三組當秘書，我向周先生請辭參事，周先生見我去志已堅，在我的辭呈上批了「割愛照准」四個字，並改聘我為僑委會顧問。自此以後，十多年來，一向獲得周先生的愛護，「照准」是實，「愛」則未「割」。當周先生出使國外的時候，常搭人帶回一條領帶或一副袖扣，這種貴一分則「俗」的禮物，使接受的人如在熱鬧中吸上一陣清風，既感故人情重，又沒有收到「金杯」、「銀碗」那樣的精神負擔。

周書楷先生對人處事，常使人有「恰到好處」之感。

高信先生與我相識甚久，在他擔任僑委會委員長的任上，我只是一個「顧」而不「問」的顧問，沒有多大的接觸。那段時間，我全力集中於僑聯總會的業務，高先生視「官」（僑委會）「民」（僑聯）一家，支持甚力，這種「風度」亦屬難能可貴！

廿三年僑事，不知從何說起！但就我來說，不能不以僑聯總會這八年秘書長的工作為重心了。

許多人常常說，僑聯總會的秘書長是一個沒

有人管的職務。照我的感覺，這種沒有人管的職務最難當，因為沒有人管的人，必使自己管自己，自管則須具備高度「自我約束」的精神。

凡事公私之間，利害之間，是非之間距離離得很近，稍不小心就會逾矩犯錯。我自信我能守份，其中亦曾以萬分痛苦的心情來守份，八年歲月，臨深履薄，無愧無疚的度過，尚可告慰於師友親朋。

我搞僑運凡僑皆保

僑聯是全球僑胞的僑聯。回憶第四次代表大會，全體理事的名單發表之後，澳門區有幾位代表聲勢洶湧的來到我的辦公室提出抗議，表示他們被遺，處理不公，聲言要招待記者發表新聞。我當時很歉然拉着他們其中最兇的人說：「僑聯等於一個寺廟，我是一個駐廟的和尚，任何人來拜神，我都一樣歡迎。因為來的人不帶黃酒白鷄，最少也帶一份紙串香燭。但有時進香的人多，寺廟的地方小，不得不分先後。我那會有私心，拒人於門外，嫌自己的廟宇香火太盛呢？」那些代表聽到我這一番話之後，苦笑一下，握手而退。

組織歸於僑胞，榮譽歸於僑胞，僑聯的大門開了。我認為最重要是培養它的生命。鄭彥棻先生說過：「無僑教即無僑務」，我在僑聯常說：「無僑生即無華僑」。因此，僑聯的工作走青年路線，使它的生命跟着一代一代的華僑青年而生長延續。

僑聯對優秀的僑生有獎學金；對優秀而又家

境欠佳的僑生有僑生免息貸款；對學行成績俱佳，而又無力升學的僑生有助學金。此外，還有華僑優秀青年獎，華僑文化獎等等。我把這些工作統稱之為「無聲的服務」。

我把僑聯的工作走青年路線的目的很單純；只希望在成千成萬的僑生中，將產生出一位或半位 國父孫中山。

吳鐵老生前對我們說過，大陸淪陷，我們要從海外打回去。僑生就是從海外打回大陸的一副本錢。

僑聯總會的組織有幾個特性：第一、海外沒有分支機構，僅有若干重要地區沒有連絡性質的僑聯祕書處的辦事處；第二、有團體會員而沒有個人會員；第三、是海外全球僑團共有的組織，以支持祖國的反共救國工作，而非國內人士組成以研究海外華僑問題的組織。

我常說：僑聯在海外雖沒有分支組織，而所有僑團都是僑聯的手足；所有僑胞的救國工作都是僑聯的工作，所有僑胞的光榮都是僑聯的光榮。

我在僑聯服務還有一個觀念：我們希望僑胞替國家做什麼？亦須先問僑聯替僑胞做什麼？回憶數年前，中共份子在香港暴動，當地僑胞為爭生存和自由，一致奮起抵抗。當時，我對香港一些反共僑領說：僑聯對大家的工作無財可助，亦無人可助，但我必定盡心盡力為大家服務。那次僑聯替他們辦理台灣入境保證甚多，只要是反共的，無論識與不識都一律代保。朋友怕我太濫會出事，將來負責不了，我開玩笑的說：「假如

萬一發生問題，我也是為國犧牲呀！」

這一服務工作奠定了僑聯在香港僑社中的信用。可是，國內也有一些主辦同志說：「梁子衡搞僑運，凡僑皆保！」我常常因此自我警惕，小心謹慎，但幸沒有稍減辦事的勇氣！

自故鄉來知故鄉事

這是一個動亂的時代，是一個艱苦的時代，是一個偉大的時代，也是一個創造的時代。

本（六十二）年三月中旬，我獲得中央海外工作會和僑務委員會的資助赴美訪問，由三月十五日出發，到四月十六日返台，前後大約一個月，經過的地方依次是檀香山、羅安琪、紐約、華盛頓、芝加哥、西雅圖、溫哥華和三藩市。

我訪美時，沒有由中央海外工作會通知各地黨部，也沒有由僑務委員會通知各地僑團。「獨來獨往」，靜悄悄的到了當地才拜會有關人士。可是，各地僑社表現得非常熱烈。我很自負的對人說，僑聯在海外不敢說有羣衆，但可以說有朋友。

我在僑聯擔任祕書長八年，這是唯一的一次出國訪問，使我獲益良多，單就觀念上，就有下列的收穫：

一、我廿年來寫過：「僑政概論」、「華僑社會研究」、「華僑政治生活」和「中國文化與海外華僑」幾本小冊，所採的資料，多限於東南亞，這次訪美，發現了美洲華僑社會的情況迥異，自己的看法須作重大的修正。

二、我近年對華僑社會有一些看法，主要認

為過去的華僑社會是「寄生社會」；現在的華僑社會是「邊際社會」；未來的華僑社會是「混合社會」。自從訪問美國後，此一看法益加堅定。

三、我發覺華僑社會已由勞力性轉變為知識性；單元性轉變為多元性；安定性轉變為動亂性。我們如果不能掌握這一趨勢，一切工作難免落空。

此外，我亦發覺海外華僑青年，包括學生、留學生和國內的人士——特別是中年以上的人士有着一些觀念上、知識上、年齡上的差距。

我曾被邀參加過三四次留學生及華僑青年的座談會。有一次，當踏進座談會議室的門首時，見到一班青年朋友「兩眼朝天」，愛理不理，我馬上直覺到，我可能是他們心目中的一塊「廢料」或一條「蛀米大虫」。我坐下來很委婉的對他們說：「我今天來跟各位見面，是談鄉情，不是談學問，君自故鄉來，應知故鄉事；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焉。談鄉情，我似乎够格。我看，我分段跟各位談好了，半小時一段，一段之後如不受歡迎，則自動滾蛋，如受歡迎，則繼續報効。」後來，我談了四段，一共兩個小時，聽說反應還好。效果不必多寫，以免「吹牛」。但由此可以證明，人與人之間，外與內之間距離之深。

一生之中無所不為

我想分析一下中共在海外的統戰陰謀來結束我這「關佬廿三年」的短文。

毛酋去（六十一）年九月，對中共海外的僑務工作有過「內緊、外鬆、紮根」的六字批。我

分析他說「內緊」是指中共的僑務政策不變，尚稱「老實」；「外鬆」則指中共當前「笑臉外交」、「笑臉僑務」、和「笑臉內政」的陰謀，這是階段性的謀略運用。深入研究，今天海外華僑對大陸中共偽政權，尚有一點鄉土感情（僑鄉在大陸），而沒有文化感情，政治感情；對自由祖國，有文化感情（傳統文化）、政治感情，而略欠鄉土感情。毛共看中這一點，運用笑臉攻勢，純為企圖培養僑胞對偽政權的文化感情，政治感情。至於「紮根」，其包藏禍心更大，我分析它有兩個基本綱領，一為將「僑務外交化」，二為將「華僑當地化」。簡言之，把中共都變成「越共」、「泰共」、「馬共」、「緬共」、「日共」、「美共」，轉變其國際顛覆工作為當地「人民民主革命運動」。

中共配合毛酋的「六字批」，現在海外大搞統戰陰謀，一圖打擊我們的政治領導中心；一圖突破華僑社會的反共態勢；一圖誘騙華僑青年，進行各種分枝活動；一圖加強國際宣傳，大喊中華民國政權地方化，以打擊我們在國際上的地位。

我訪美時間，當地僑胞多數憂心忡忡。我很樂觀的對他們說：中共以中國歷代「農民造反」的方式奪掠大陸後，它有軍事、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文化幾個層次。當它由軍事層次轉入政治層次，即發生了亂的現象，乃企圖以社會、經濟改造來搶救政治層次；當它進入社會、經濟層次之後，即陷入百家爭鳴，奪權鬥爭，四分五裂的情況，乃又企圖以文化來搶救社會、經濟層次，因

此而有「文化大革命」的產生；當它進入文化層次之後，中共政權即表現崩離析的狀態了。中共什麼都可以自吹多數，只有文化它不敢自吹多數。中共在海外怎樣兇，怎樣動都不必恐懼，它絕不能跳越文化層次，亦絕不能在文化層次中繼續存在。

廿三年，我在訪問美國中上了最有價值的一課。無疑是一頓遲來，但非常豐富的「晚餐」！誰知當我吃完這頓晚餐後轉業了！

我曾拜讀鄭彥豪先生大作「往事憶述」中「乃役於僑十二年」一文，（原載本誌六十二年三月及四月號）其中有一段話說：

「我有一位在音樂界很有成就的同學黃友棟教授曾說：『如果說我在音樂方面有一點貢獻，就因為我一生祇做一件事——從事音樂教育。』我似乎可以套用他的話來說：『如果說我在事業上沒有成就，就因為我一生不專做一件事。』

鄭、黃兩先生的話都太謙虛。

我正好套用鄭、黃兩先生的話來說：「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卒，一生只有工作沒有事業；如果說我在工作上沒有作為，就因為我一生無所不為（我做過教師、政工、僑務、黨務，現又由海外工作改做國內工作）」。

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四日於台北

委刊廣告及訂閱中外雜

誌請撥電話 772480